



Lionel Shriver

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

凯文怎么了

[美] 莱昂内尔·施赖弗 著 李尧 李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Lionel Shriver

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

We Need to
TALK ABOUT
KEYVIN

凯文怎么了

[美] 莱昂内尔·施赖弗 著 李尧 李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凯文怎么了 / (美) 施赖弗 (Shriver, L.) 著; 李尧, 李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1

书名原文: 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

ISBN 978-7-5327-6377-1

I. ①凯… II. ①施… ②李… 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0779 号

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

Copyright © 2003 by Lionel Shriv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therspoon Associate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图字: 09-2011-620 号

凯文怎么了

[美] 莱昂内尔·施赖弗 / 著 李尧 李平 / 译

责任编辑 / 张颖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312,000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6377-1/I · 3810

定价: 4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1002271

孩子需要爱，最起码他应该被爱。

——厄玛·邦贝克

译者前言

莱昂内尔·施赖弗 (Lionel Shriver, 1957—) 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父亲是一名长老会牧师。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旅居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市长达十二年, 其间在内罗毕居住一年, 在曼谷待了几个月, 现居伦敦, 二〇一二年加入英国国籍。

莱昂内尔以新闻记者为业, 为《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和《经济学人》等刊物撰稿, 二〇〇五年起成为《卫报》的专栏作家。作为一名小说家, 她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虽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她就陆续出版了《雌性物种》(*The Female of the Species*, 1986)、《检查与改进》(*Checker and the Derailleurs*, 1987)、《流血的心》(*The Bleeding Heart*, 1990)、《体面的普通罪犯》(*Ordinary Decent Criminals*, 1992)、《游戏控制》(*Game Control*, 1994)、《完美家庭》(*A Perfectly Good Family*, 1996) 和《双重错误》(*Double Fault*, 1997) 等七部长篇小说。但这些书并没有给出版社带来经济效益, 也没有给莱昂内尔·施赖弗带来多大影响。

一九九九年, 莱昂内尔·施赖弗开始写《凯文怎么了》一书。这本书更是命运多舛, 刚写完就遇上了“9·11事件”。在当时沉闷得令人窒息的气氛中, 谁会读这样一本毫无轻松可言的书呢? 何况书中还提及了要炸掉世贸大楼的双塔! 就这样, 书稿先后被二十多家出版公司退稿。然而, 随着校园枪击案在美国愈演愈烈, 人们对这一社会问题也愈发关注, 《凯文怎么了》终于在二〇〇五年出版。该书出版后, 因其深刻的思想性和别具一格的创作手法而受到广泛好评, 并引起很大轰动。二〇〇五年, 《凯文怎么了》获得英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奖之一——“橘子

文学奖”(Orange prize)。“橘子文学奖”专为女作家设立，用以奖励上个年度女作家在英国出版的优秀长篇小说(女作家的国籍不限。二〇一三年该奖项改名为“贝利斯女性小说奖”)。二〇一一年，电影艺术家琳恩·拉姆塞以极大的勇气将这很难处理的书籍精心改编成电影，并大获成功。莱昂内尔·施赖弗和她的作品在西方世界风靡一时。除上述作品外，莱昂内尔·施赖弗还撰写了几本很有影响的好书。包括《生日后的世界》(*The Post-Birthday World*, 2007)、《何处可归》(*So Much For That*, 2010)、《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 2012)和《大哥》(*Big Brother*, 2013)。

《凯文怎么了》以书信体的形式讲述了校园杀人案的制造者凯文从娘胎里开始的成长历程，对人的本性、善恶做了非常深刻的剖析。有评论家指出，这本书“没有简单地责怪父母疗伤，而是举起镜子，映照出美国文化，指出人人皆要反思凯文现象”。这本书还“揭穿了有关家庭的一个秘密：父母对孩子寄予希望，而有的孩子并不如人意”。但是许多家长却无视这样一个事实：造成这种“不如人意”的根本原因正是父母本身。书中以丈夫富兰克林为代表的“四舍五入”思想就是根源之一。富兰克林生活在想象之中，脱离现实，脱离生活，对孩子纵容无度、不肯批评。对美国之外的世界漠不关心，一直沉湎于一个从来都不存在的观念之中，就如一只把头埋在沙中的鸵鸟，对“恶”无视，对“善”漠视。而以妻子伊娃为代表的一方，貌似信奉平等主义，喜欢美国之外的世界，对美国吹毛求疵，实际上是另外一种理想主义的代表。她对他人、他人，只有猎奇心理，并非真正接受。和许多美国人一样，他们打着肤浅的“世界主义”的幌子，以平等、尊重为借口，忽略了深层次地关心、爱护孩子，终于导致悲剧的发生。因此，父母双方都在客观上为凯文的诞生、成长、乃至最终走上邪路提供了“沃土”。书中的凯文——这块“沃土”培育出来的“恶之花”，则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小人。他把别人，包括自己的父母都当成对社会和人类报复的工具。他仿佛一个天生的恶魔，没有良知，没有人性，更没有宗教感。他叛逆狡诈、工于心计，从小就做出许多令人发指的恶行，却得不到以父母、学校为代表的

社会的及时纠正。这便暴露出美国这个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极大富足”而自居的“龙头老大”的弊端。而在所有这些弊端中，“青少年屠杀是一个更大悲剧的隐喻。它告诉人们，在这个国家，用钱能买到一切，但却买不到生命的意义感”。而书中的其他人物——一些伪善的美国人，更被作者剖析得入木三分。凯文校园杀人案受害者之一的母亲玛丽·伍尔福德女士狂热而虚伪，借宗教之名打压别人，想把流浪汉、醉鬼等从她生活的社区清除出去，以为这样做便万事大吉。而围绕在她周围的人们肤浅刻薄，缺乏同情心，尤其对杀手凯文的母亲——一个同为杀人案的受害者、并且痛失丈夫和女儿的可怜女人——没有表现出丝毫恻隐之心，相反还让她倾家荡产、无以为生。

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本让人读了各感压抑的小说，它似乎触及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人性最柔软、最容易混淆的善与恶的界限。作者莱昂内尔·施赖弗出身于宗教色彩浓厚的家庭，对所谓的恶有着深刻的理解。她认为，宗教给人提供反叛的前提和出发点。伊娃和富兰克林分别背叛了亚美尼亚东正教和新英格兰的新教，但是他们都曾经深受宗教传统影响，知道自己所摒弃的是什么。他们的儿子凯文则从来没有进过教堂，对世界万物既没有敬畏之心，也没有敬仰之情。而恶在世界上是客观存在的。一桩恶事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某个特定的个体。孩子的恶不能一味地怪罪于父母。因此，救赎是可能的。莱昂内尔·施赖弗认为，可以通过舍财来涤罪，如伊娃卖掉自己的公司、卖掉房子来赔偿受害者家属。也可以通过爱他人、冰释前嫌，来达到救赎的目的。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伊娃真正接受了自己心狠手辣的儿子，打算去爱他。而伊娃这种心理上的转变对凯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者为我们压抑的心指出一线光明——从人的角度去关心每一个心灵，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遏制恶的产生。众所周知，近年来美国校园枪击案屡屡发生，对美国朝野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凯文怎么了》在所有描写同类题材的作品中，独辟蹊径，把校园杀人案提升到了国际和历史的高度。女主人公伊娃的亚美尼亚背景在这本书里显得尤为重要。美国就是一个小小的国际

社会，由多个民族、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组成。校园杀人案影射了国际背景下的冲突。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对犹太人的屠杀、对黑人等弱势群体貌似尊重实则小觑的事实都表现出一种冷血，影响了无数像凯文一样的青少年。凯文并非被游戏所害，但是的确受到了媒体的影响。“看电影”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行动者”和“观看者”。“观看者”并非更正确、更伟大，“行动者”才更纯粹。他是“生产者”，而他人是“消费者”。于是，他的恶行是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或许这就是这本书的深刻和独到之处。

《凯文怎么了》的写作手法也别具一格。全书从头到尾不分章节，而是通过伊娃写给亡夫一封封信娓娓道来。虽然没有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情节，但描写得生动细腻，情真意切，让人难以释卷。二零一三年三月，莱昂内尔·施赖弗应邀来中国，参加北京“老书虫”文学节，在“老书虫”三里屯店举办了两场讲座。她的到来和她的多部作品，包括《凯文怎么了》在中国出版，将使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和美国当代社会能有更多的了解。

译者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北京

2000年11月8日

亲爱的富兰克林，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今天下午发生的一件小事让我提起笔来给你写这封信。不过自从我们分开，我最怀念的就是回家之后，把一天里发生的奇闻趣事都告诉你。就像一只猫把抓来的老鼠摆在你的脚旁——那是一对猫夫妻分别在两个后院草料堆中搜寻之后，为自己的另外一半献上的一小的、不值一提的礼物。要是你还像往常那样在我的厨房里，马上就要吃饭了，你肯定又在往格兰诺拉面包片上涂抹南乳花生酱。我手里拎的袋子还来不及放下——其中一个还在往外流汤——就迫不及待地要给你讲点儿什么。晚上要吃意大利面了，我甚至来不及责怪你能不能别把整个三明治都吃完呀！

早些年，当然啦，我讲的尽是一些异域风情的小故事，给你讲里斯本，讲加德满都。可是说实话，谁想听那些外国故事呢！虽然你很有礼貌地听着，但我还是觉察到，你打心眼儿里更愿意听听发生在家门口的一些逸闻趣事。比方说，在乔治·华盛顿大桥上与收费员非同寻常的邂逅什么的。平凡中出奇迹有助于验证你的观点，你认为我在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都是骗人的鬼话。我旅行带回来的“纪念品”——一包已经放久了的比利时华夫饼，英国人称之为“皮夫”（废话之意！）——仅仅因为距离遥远就被人为地涂上某种神秘色彩。就像日本人相互之间送礼物一样，盒子里装着袋子，袋子里套着盒子。我从遥远之地带回来的礼物都不过是包装而已。若是仅仅在老纽约州还没有变质的垃圾堆里翻腾翻腾找到点什么，或者在到奈阿克^①大联盟超市的路上搜集点奇闻轶事，

^① 纽约州的一个小镇。

岂不是更了不起的成就吗？

我的故事还真发生在那里。看起来，我终于学会你一直想要教我的东西，那就是我自己的国家跟阿尔及利亚一样风情独具、危机四伏。我站在卖奶制品的货架旁边，用不着买多少奶酪，以后也没必要。现在没有你帮我干掉大半碗意大利面条，我再也不吃那玩意儿啦。哦，我真怀念你这个“嗜好”。

在大庭广众抛头露面，对我来说还很难。欧洲人向来把美国称为“没有历史感”的国家。你可能认为，在这里，我会因美国人著名的健忘症而受益。可惜运气不佳，这个“社区”没有任何遗忘的迹象。虽然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一年零八个月，但是家里食物快吃完的时候，我还是得硬着头皮出门去买。哦，霍普韦尔大街上7-11便利店^①的售货员对我已经“司空见惯”，我可以买上一夸脱牛奶而不被硬盯着看。但是在我们常去的大联盟，我却依然是“众矢之的”。

在那儿，我总是不能理直气壮。为了增加点儿底气，我强迫自己挺直后背，端起肩膀。现在我总算明白人们常说的“昂首挺胸”是什么意思了。挺拔的身姿可以改变人的内心。这一点常常让我惊讶。当我气宇轩昂站在那儿的时候，羞耻之感就稍微有所减缓。

我正在琢磨该买大号还是中号的鸡蛋之际，无意中朝摆放酸奶的冷柜瞥了一眼。几步开外，站着一位顾客，她满头黑发枯杂不堪，发根处一英寸的地方已经开始泛白，发卷只在发梢依稀可见。显而易见，自打上次烫发之后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她淡紫色的上衣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裙子也许显而易见曾经很入时，可如今衣袖紧紧地箍着胳膊，短裙凸显着肥大的屁股。她这一身行头急需熨烫，垫肩处隐隐约约看得出金属衣架留下的锈渍。我由此想到，肯定所有别的衣服都穿脏了，或者堆在

^① 7-11 便利店：该品牌原属美国南方公司，后于 1974 年由日本零售业经营者伊藤洋华堂引入日本，并于 2005 年完全成为日本公司。目前，7-11 连锁便利店遍布全球各地。

地板上，她才不得已从衣柜深处捞出这套衣服。那个女人向再制干酪^①探过头去，我看见她的双下巴上满是皱褶。

别绞尽脑汁猜她是谁了。从我描绘的这幅图画，你永远也认不出她是谁。曾几何时她苗条得有些过分，浑身上下充满骨感，像包装好的礼物，光鲜靓丽。尽管把失去亲人的人说成“形容枯槁”兴许比较浪漫，但是我觉得，哀伤时，吃巧克力和喝自来水没有两样。另外，有些女人保持苗条的身材，不是为了取悦配偶，而是为了跟女儿比美。不过，多亏我们，如今她失去了这份情致。

她是玛丽·伍尔福德。我没有因为认出她而骄傲，恰恰相反，我无法面对她。那一刹，我头晕目眩。我双手直冒冷汗，在盒子里翻来翻去，察看鸡蛋是否完好无损。我装作突然想起要去旁边那个货架找东西的样子，先把鸡蛋放在推车的婴儿座上，不使它掉下来，然后就佯装去挑拣东西。又因为担心轮子会发出吱吱的响声，我干脆把推车扔到一边儿。那一刻，我连气也喘不过来。

我本来应该心里有所准备。事实上，我常常做了充分的准备，就成全副武装也不为过，哪怕事后证明并无此必要。可是我不可能在出门做每一件小事的时候都“披盔戴甲”。再说，玛丽现在还能把我怎么样？她的招数已经用尽，她把我告上了法庭。话虽这么说，可我的心还是怦怦直跳，不敢马上回到摆放奶制品的架子那边，虽然想起了从埃及买的那个绣花手提包还在购物车里搁着，包里还装着钱包。

这是我当时没有逃离大联盟惟一的原因。我总得偷偷摸摸回到放包的购物车跟前呀。于是，我拿起一罐金宝汤公司的奶酪芦笋罐头，心不在焉地看着，漫无目的地想，假若沃霍尔^②看到罐头盒上的图案被重新设计，该多惊讶啊。

① 再制干酪：以熟化了的天然奶酪为原料而再次利用的产品，所有蛋白质及其降解物都重复经受热处理，因此其营养性能也就差远了。

② 沃霍尔(1928—1987)：美国艺术家、印刷家、电影拍摄者，是视觉艺术运动、波普艺术最有名的开创者之一，并曾成功地担任金宝汤公司的罐头美工设计。

等我回来的时候，那个货架旁边已经空无一人。我立刻推起购物车，俨然一个行色匆匆必须三下五除二干完家务事的职业女性。你一定想，你不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吗？可是我很久没有这样看待自己了。我觉得，在那些排在我前面等待交款的人眼里，我这样不耐烦并非因为我是——一名职业女性——她们帮助丈夫养家糊口，时间就是金钱——而是因为我更像一个逃犯，惶恐不安，恨不得马上溜走。

我把要买的那堆五颜六色的东西从购物车里取出来。鸡蛋盒子黏糊糊的，收银员打开查看。啊，玛丽·伍尔福德还是认出我了。

“十二个全破了！”那个姑娘惊讶地喊了起来，“我得让他们给您换一盒。”

我拦住了她。“不，不用了，”我说，“我着急走。就这样吧。”

“可是鸡蛋全都……”

“就这样吧！”在这个国家，要想让别人乖乖地听你的话，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他们觉得你有点精神错乱。收银员用面巾纸擦了擦鸡蛋盒上的条形码，在机器上扫了一下，然后眼珠骨碌骨碌地转着，擦了擦手。

“哈查多琳，”我递上借记卡，收银员念着我的名字，声音很大，仿佛是说给排队人听的。快到傍晚了，正好是学生放学后打工的时间。这个姑娘大约十七岁，没准儿是凯文的同学呢。当然，这一带有好几所中学，她家兴许刚刚从加州搬来的呢。但是，看到她的眼神，我不再这么想。她直盯着地看着我，“这个姓不常见呀。”

我不知道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不过这些事情真是让我烦透了。并非我没有羞耻之心，恰恰相反，我被所谓羞耻弄得筋疲力尽，浑身上下宛如沾满黏乎乎的鸡蛋清。这是一种无处宣泄的情感。“全纽约州姓哈查多琳的只有我一个，”我自我解嘲道，没好气地拿回借记卡。她把鸡蛋扔进一个塑料袋里，更多的蛋清流了出来。

我就这样回到了家——权且叫做家吧。你当然没有来过这里，那就让我给你描述一下吧。

你会大吃一惊。特别是当初我吵着闹着不想搬到郊区，如今却选择继续留在格拉德斯通。我是觉得应该住在离凯文不远、开车就能到的地方。除此而外，尽管我渴望没有人能认出我是谁，但并不是想让邻居们忘记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求之不得，但是又有哪个城镇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呢？全世界只有这个地方能完完全全感觉到我生活中经历的所有变化。如今人们是否喜欢我远没有比是否理解我来得更重要。

付完律师费之后，剩下的钱虽然不多，但足够买一套小房子。只是租房子暂住在这里对我更为合适。我觉得，自个儿在这种积木玩具似的公寓套房生活，就像琴瑟和谐的婚姻，再合适不过了。噢，你恐怕要吓一跳，这些用很不结实的纤维板做成的家具是对你父亲的座右铭“材料决定一切”的公然挑衅。可我喜欢的恰恰是这种“靠不住”的感觉本身。

这里的一切都不牢固。通往二楼的楼梯陡峭，却没有扶手。我要是喝完三杯葡萄酒之后上楼睡觉，脚踩楼梯就会感到头晕目眩。地板吱吱作响，窗框走风漏气，整幢房子给人一种弱不经风、摇摇欲坠的感觉，仿佛整幢建筑就像设计极差的危楼般随时会轰然倒塌。楼下的卤素小灯泡用几个生了锈的衣架支撑着，连在天花板下的一根电线上，晃悠悠，忽明忽暗，为我的新生活平添了一种明灭不定的色彩。电话插座脱落，我与外部世界惟一的“联系”在两股焊接得十分糟糕的电线上不停地摇晃。晃来晃去，“联系”便常常被切断。房东倒是许诺给我换个好炉灶，可是对于我，换不换无所谓——炉灶上显示“开”的灯根本不亮。前门的把手经常一拧就掉，我只好再设法把它塞回去。但是那一截锁轴似乎在嘲弄我，或者说，像母亲一样在提醒我：不能离开这个家。

我还发现，这幢二层楼的“大方向”是把资源利用到极致。供暖不足，暖气片半死不活，散发出一点点热气。尽管还是十一月初，我已经把阀门开到最大了。冲澡的时候我只用热水，不兑凉水。而所谓热水的温度只不过让我不发抖而已。洗澡的时候，我惴惴不安，生怕热水马上用完。冰箱的刻度已经调到最大，可是牛奶只能保存三天。

说到装修风格，这幢房子简直是对这个词的嘲弄。房子的楼下刷成

亮黄色，活儿干得非常粗糙，作为底色的白涂料一条条依稀可见，似乎是用蜡笔胡乱画出来的。楼上我的卧室里，墙壁用海绵蘸着浅绿色涂料涂抹而成，俨然是小学生的涂鸦之作。这所摇摇欲坠的小房子——显得那样不真实，富兰克林。而我跟它没有两样。

可是我并不想让你为我难过。让你难过不是我的本意。如果愿意，我完全可以找到更体面的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喜欢这里。这所房子没个正形，像玩具。我住在一个“玩具之家”倒也不错。连家具都不合比例。餐桌齐胸高，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未成年人。而我放电脑的床头小桌用来打字又太矮——高度只够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吃椰丝曲奇和喝菠萝汁。

也许这种歪歪斜斜、幼稚可笑的氛围能够解释我为什么昨天没有去投票选举总统。我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发生在遥远的地方。如今这个国家非但没有能够为我的“错位”找到正确的“对位法”，反而将我带入了超现实的领域。选票已经被统计，可是就如同发生在卡夫卡的故事中的那样，没有人知道赢家是谁。

现在我拥有的就是这一打破鸡蛋。我把已经所剩无几的蛋黄、蛋清倒到碗里，把碎蛋壳挑出来。要是你在，我会煎一份美味的菜肉馅蛋饼，再加上切成方块的土豆、芜荬叶。要想味道鲜美，秘诀就在于加上一茶匙糖。一个人嘛，我只能把剩下的这点玩意儿放到锅里，翻炒一下，拨弄拨弄。反正一样吃下去。我发现玛丽的姿势挺优雅，虽然还未做到位。

起初，看到食物我就恶心。去拉辛^①看望母亲的时候，她做好的大米羊肉菜叶包一端上来我就想吐。尽管她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用热水烫葡萄叶子，把卷好的羊肉和米饭塞进去，做成一个个有棱有角的小包子。我提醒她，可以放到冰箱冷冻起来；在曼哈顿，去哈维律师事务所的路

① 拉辛：美国威斯康星州东南部城市。

上，匆匆路过第七大街熟食店的时候，熏牛肉的辣味让我胃里翻江倒海。可是反胃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对那种感觉我甚至还有点怀念。四到五个月之后，我肚子有了饿的感觉——事实上是狼吞虎咽。好胃口让我觉得很体面，于是我继续扮演一名对食物失去兴趣的女人的角色。

大概一年之后，我开始面对现实——这个“舞台”、这场“表演”对于我毫无意义。即使我变得骨瘦如柴，也没有人会在意。我期待你用那双可以测量马的肥瘦的大手箍住我的胸腔，把我举过头顶，并严厉地责备道：“你太瘦了吧？”那口气西方女人听了都会暗自高兴。

于是我现在每天早上喝咖啡，吃一个牛角面包。用湿润润的食指把掉下来的面包渣都粘起来吃掉。我慢条斯理地切卷心菜，消磨漫长长夜难熬的时光。如今打电话邀请我出去的人少得可怜。然而，即便如此，有那么一两次，我还是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来电话的一般都是外国朋友，平常通通邮件，好多年都没有见过面。特别是那些不知道实情的朋友，我避之唯恐不及。至于他们是否知情，我一般从电话里都能听得出来。不知情的人，打电话时粗喉咙大嗓门，说起话无所顾忌。而知道内情的人，一开口就毕恭毕敬，结结巴巴，轻声细语，十分拘谨。我自自然不想把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复述一遍，也不期待得到朋友们无言的同情。他们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要想把谈话继续下去，还得我把那些事情和盘托出。而真正让我向他们不无歉意地说自己“太忙”的原因是，生怕两个人都点个沙拉，账单送来的时候，才八点半或者九点，我不得不起身回那个小窝。让人心悸的是，家里连可以用来消磨时间切的菜也没有了。

说来好笑，在为《飞行之翼与祈祷者》写文章而奔走了那么多年之后，我怎么能固定下来天天吃这种程式化了的食物？那时候，我每天晚上换一个餐馆，服务员说西班牙语或者泰语，菜单上写的是酸橘汁腌鱼或者狗肉。更糟糕的是，这让我想起母亲。但是我不能打破已然排列好的先后顺序（一长块奶酪，或者六七个橄榄；鸡胸，排骨或者煎蛋卷；热蔬菜；一块香草三明治饼干；半瓶葡萄酒），我仿佛是在走平衡木，

一脚踩空就会摔下去。现在，我已经不得不放弃吃荷兰豆，因为那玩意儿做起来太容易了。

不管怎么说，即使我们俩的关系变得疏远，我也知道你还是为我吃饭的事而担心。你向来如此。多亏了玛丽·伍尔福德今晚小小不言的报复，我吃得很饱。邻居们种种古怪行为都不能像她这样起到“安慰剂”的作用。

比方说，我还住在帕利塞德大街我们那幢被人们誉为“暴发户平房”（富兰克林，不管你是否喜欢这个称呼，事实就是这样的，那是一座平房）的时候，有人把好几加仑深红色的油漆泼洒到房子前面的游廊。窗户和门也都弄得一塌糊涂。他们趁夜色“光临寒舍”，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油漆快干透了。哦，我该怎样称呼那个黑色星期四呢？当时——一个月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之后——我心里想，我不会再害怕，也不会受到更多的伤害了。我认为，那可能是一种很常见的自负吧，觉得你已经承受了那么多打击，而这些打击加在一起，会给你安全之感。

那天早晨，我从厨房出来，拐了个弯儿走进起居室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以为自己已经平安无事、可以刀枪不入的念头简直是异想天开。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或者至少从没有被油漆污染过的那几扇玻璃窗流泻进来，从那几片油漆很薄的污渍透漏进来，在白墙上投下血红的光，宛如中餐馆里俗艳的装饰。

我以前总是硬着头皮面对自己害怕的东西，对此你颇为赞赏。不过这个方针是因为害怕在异国他乡迷失方向想出来的——如同儿戏。现在，我多么想回到那些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日子里啊（儿戏本身，比方说）。不过，积习难改，我并没有逃回到床上，蒙头大睡，而是下决心去查看一下遭受了多大的损失。但是前门打不开，门框和门扇被黏稠的深红色的瓷釉牢牢黏在一起。瓷釉不像乳胶，不溶于水。而且瓷釉价格昂贵，富兰克林。为了这场恶作剧，有人花了不少钱。当然，我们那些老邻居有各种各样的不足，只是从来不缺钱。

于是，我穿着和服式晨袍从侧门出去，绕到前面。“观赏”邻居的“美术作品”时，我觉得脸上戴着“冷漠的面具”。那是《纽约时报》描绘我在法庭上的表现时说过的话。《邮报》更毫不客气地说我在法庭上至始至终“目中无人”，而我们当地的《新闻杂志》愈发过分：“伊娃·哈查多琳板着面孔，仿佛她儿子只不过是把女孩儿的辫子在墨水瓶里蘸了一下而已。”（我承认自己在法庭上是板着面孔，目不斜视，吸着腮帮。我记得当时一直在心里念叨你的“硬汉子”格言：“不要让人看到你出汗。”可是富兰克林，“目中无人？”那会儿我还有心思“目中无人”吗？能让自己不哭出声来就不错了。）

那效果确实惊人——如果你喜欢戏剧性场景的话。我那会儿当然没有心情欣赏如此“美景”！房子宛如人被割断喉咙。油漆四溅，仿佛做罗夏克墨迹测验^①时喷涌而出。油漆经过精心挑选——颜色浓重，质感很强，还带一点蓝紫色——可能是特意调制而成的。我不禁想，如果泼油漆的人是事先订购这种颜色的油漆，而不是从商场货架子上取下来付款走人的话，警察应该能够查出是谁干的。

除非不得已，我不会再跨进警察局半步。

我这件晨袍非常单薄，那还是1980年我们第一个结婚纪念日时你送我的，本来是夏天穿的。这是你给我买的惟一一件晨袍，我不想再去找别的衣服。我丢掉了那么多东西，但是你给我的或者你留下的东西我一样也没舍得扔掉。我承认你留下的这些“护身符”很折磨人。而这恰恰是我视若珍宝、不肯丢掉的原因。喜欢耸人听闻的治疗学家肯定会说我凌乱的衣柜“不益于健康”。恕我不能苟同。与凯文、油漆、刑事和民事审判带来的叫人畏缩、感觉肮脏的痛苦相比，这种“痛苦”简直就是有益于健康！六十年代人们对所谓“有益于健康”不屑一顾，我却渐渐把它视为难得的法宝。

关键是，手里抓着柔软的蓝布晨袍，对邻居仓促间绘制又免费赠送

^① 罗夏克墨迹测验：一种心理投射测验。